

On Paronymic Attraction and Homonymic Clash in Han Dialects

著者	太田 斎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The Kobe Gaidai Ronso : The Kobe City University Journal
volume	50
number	5
page range	19-36
year	1999-10-31
URL	http://id.nii.ac.jp/1085/00001482/



论汉语方言中的 “类音牵引”和“同音词冲突”

太 田 斋

一般说来，一对或一系列相互有类音关系的词往往有两种相反方向的音变倾向：一种是其中的一个向另一个靠拢，终于同音化；另一种是为了避免误会，用改音或改词等手段扩大差别。前者叫做“类音牵引”(paronymic attraction)，后者叫做“同音词冲突”(homonymic clash)。前者有别名叫“同音牵引”(homonymic attraction)，但本文不采用它。现据《言语学大辞典》(日本三省堂 第6卷【术语编】1996.1 第1393-1395页)“类音牵引”条略加说明一下。在说话者的意识里，一个个的词决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意义以外，语音形式上也呈现各种联合关系。因此一群有类音关系的词语之间总有一种像引力的力量互相牵引。这种牵引作用不一定需要意义上的关联。有意义上关联的变化，把它叫做“俗词源学”(folk etymology)或者“交感”(contamination)。这三者的界限有时不能截然划分。下面一些算作后者的例子，本文也把它们包括在“类音牵引”内一起讨论。

本文以‘’代表一系列同源词，以“”表示与其字音对应的汉字。因篇幅所限，方言例子出处大都不注明。有些字的标音用“汉语拼音”，为了区别于国际音标，把它们放在//中。本文所说的“同源词”及“类音词”，其讨论对象是一般会话当中出现的词音，这不一定等于读字时候出现的字音。文中所说“同音词”是广义的，有时扩大含意，连“类音词冲突”也包括在内。

1. ‘燕’—‘雁’；‘蝙蝠’—‘蚂蚁’；‘蝙蝠’—‘壁虎’

先看“同音词冲突”的例子。为了避免误会，同音词往往发生特殊变化，如“附加说明成分”、“改词”、“改音”等等。严格说来，“附加说明成分”也是一种“改词”，可是我们这里把“改词”限于替换“词干”(stem)，以区别两者。下面是“附加说明成分”的例子：

山西屯留：“燕：~子”ian⁵¹(去) ≠ “雁”ian¹³(阳平)

小燕儿 ɕio⁵³⁴⁻⁵³ iər¹³ : 大雁 ta¹³ ian⁵¹;

雁 ian⁵¹

材料来源是《屯留方言志》，该书作者张振铎、刘毅二位先生已指出‘燕子’为了区别于‘大雁’加儿尾(第14页)。此方言里一部分浊声母(即古全浊和次浊)去声字现属于阳平。看该书同音字表，“燕”、“雁”声调不同，可是作为一个词，“雁”念为去声，与“燕”单字音相同。不知“雁”字是原有去声单字音，还是经过特殊音变后读为去声。看来，“小燕儿”的连读变调也较特殊，不符【上十去】的规则，而与【上十阳平】一致。也许是“燕”另有阳平字音。即使“燕”、“雁”两字不完全同音，但有类音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由于同音冲突，不只‘燕子’加儿尾或子尾，前面加“小”字，‘大雁’前面也加“大”或“老”字，强调两者大小对比以免误会。下面补充一些例子：

河南开封：燕儿 iər³¹² ↔ 大雁 ta³¹²⁻²¹³ ian³¹²

河南郑州：小燕儿 siau⁵³ iar³¹² ↔ 雁 ian³¹²

河南邓州：小燕儿 siə⁵⁴ iər³¹ ↔ 大雁 ta³¹²⁻¹³ ian³¹

山东牟平：燕儿 ianr¹³¹ ↔ 老雁 lao²¹³ ian¹³¹

小燕儿 ɕiao²¹³ ianr¹³¹

山东济南：燕子 iā³¹⁻⁴² tsŋ⁰ ↔ 大雁 ta³¹ iā³¹

山东冠县：? ↔ 雁哥 ian³¹² kə⁰

陕西白水：燕弟(缺音标) ↔ ?

贺登崧神父(W. A. Grootaers) 1946年指出，山西大同‘蝙蝠’和‘蚂蚁’发生同音词冲突。⁽¹⁾近十年来，山西刊行了不少方言志。我们能从其中找出如下

一些例子，即：

山西中阳：夜蝙蝠 ia⁵³ p^hiə[?] xu⁵³ 蝙蝠

马白虎 mia²⁴ p^hiɛ[?] xu²⁴ 蚂蚁

山西河津：夜撒蝠 ia³³ p^hiə³¹ fu⁰ 蝙蝠

妈妈撒蝠 ma⁵³ ma⁰ p^hiɛ³¹ fu⁰ 蚂蚁

山西定襄：夜蝙蝠 ie⁵³ p^hiə[?] fu³¹ 蝙蝠

蚂匹蝠 ma²¹⁴ p^hiə[?] fu³¹ 蚂蚁

山西文水：夜麦虎 i³⁵ mia[?] xu⁴²³⁻²¹ 蝙蝠

麦麦虎儿 mia[?] mia[?] xu⁴²³⁻²¹ e²² 蚂蚁

山西介休：夜蜜蝠儿 iɛ⁴⁵ miɿ[?] xur¹³ 蝙蝠

蜜蝠儿 miɿ[?] xur¹³ 蚂蚁

山西芮城：夜 (ia⁴⁴) 蝙 (p^hiɛ) 蝠 (p^həŋ) 蝙蝠

妈妈蚩 (p^hiɛ) 蝠 (p^həŋ) 蚂蚁

可能‘蝙蝠’先有如下变化，即：

pian fu → p^hian fu → p^hiə fu → p^hiə xu → p^hiə? xu

或许 f → x 的变化比 p → p^h 早。山西方言‘蚂蚁’相应词原来是‘蚩蝠’。

‘蝙蝠’的发音靠拢‘蚂蚁’，后来为了区别两者，‘蝙蝠’加‘夜’字，‘蚩蝠’加同义词‘蚂蚁’的‘蚂’字了。上面文水、介休的‘蝙蝠’相应方言形式为何第二音节声母变成 m-，笔者还没有可靠的解释。现暂提出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由于‘俗词源学’变来的，就是说‘夜蝙蝠’，从其‘夜’字人们都很容易联想到‘睡觉’，‘蝙’、‘眠’音近，因此变为‘夜眠蝠’（如河北赵县：夜眠虎 蝙蝠），后来发生舒声促化，终于变为如上形式了；第二是由于‘类音牵引’变来的，即‘蚂蚁’相应词带‘蚂’后，‘蚩’被同化变为 m-。后来‘蝙蝠’与此发生‘类音牵引’，其‘蝙’字声母也变为 m-了。‘蚂蚁’的音变过程概略如下：

ma p^hi/pi fu → ma p^hiə[?]/piə[?] xu → ma miə[?] xu → mia miə[?] xu

→ mia[?] mia[?] xu → miə[?] miə[?] xu

依据这个说法，还不到完全同音的阶段，附加说明成分，后来两者词干部分（即第二，三个音节）发音进一步靠拢，终于完全一致了。与此发生“类音牵引”的‘蝙蝠’大概如下演变：

$i\text{ə pian fu} \rightarrow i\text{ə pian/p}^h\text{ian fu/xu} \rightarrow i\text{ə pi}\text{ə?/p}^h\text{ie? xu} \rightarrow i\text{ə mi}\text{ə?}$
 $xu \rightarrow i\text{ə mi}\text{ə? xu}$

介休‘蚂蚁’先有过（“蚂蚁蛉”→）“蜜蜜蛉”的阶段，可能后来发生“叠音脱落”（haplology），成为“蜜蛉”了。即使演变过程还待详细讨论，不过把上面例子看做为了回避“同音词冲突”加上说明成分而成立的例子，是毫无问题的。

岩田礼先生曾指出山东方言中‘蝙蝠’与‘壁虎’发生同音冲突。⁽²⁾这种情况不只在山东出现，云南方言中也有如下例子：

‘蝙蝠’—‘壁虎’

云南昆明：夜壁蝠	$i\text{æ}^{212} \text{pi}^{31} \text{fu}^{31}$	蝙蝠
山壁虎	$\text{ʂ}\bar{\text{A}}^{44} \text{pi}^{31} \text{xu}^{53}$	壁虎
云南玉溪：夜壁虎	$\text{jie}^{213} \text{pi}^{31} \text{xu}^{42}$	蝙蝠 ⁽³⁾
山壁横儿	$\int\bar{\text{A}}\text{n}^{44} \text{pi}^{31} \text{hu}\text{ə}^{31}$	壁虎 ⁽³⁾
云南昭通：夜壁虎	$i\text{e}^{31} \text{pi}^{31} \text{xu}^{53}$	蝙蝠
爬墙虎	$\text{p}^h\text{A}^{31} \text{t}\text{e}^h\text{i}\bar{\text{A}}\eta^{31} \text{xu}^{31}$	壁虎
云南文山：夜壁虎	$i\text{e}^{211} \text{pi}^{42} \text{xu}^{44}$	蝙蝠
壁虎	$\text{pi}^{42} \text{xu}^{44}$	壁虎
云南蒙自：夜壁蝠	$i^{211} \text{pi}^{42} \text{fu}^{55}$	蝙蝠
壁猴	$\text{pi}^{42} \text{x}\text{əu}^{42}$	壁虎
云南思茅：夜壁虎	$i\text{e}^{213} \text{pi}^{31} \text{fu}^{53}$	蝙蝠
壁猴	$\text{pi}^{31} \text{x}\text{əu}^{31}$	壁虎

可能如上云南方言‘蝙蝠’词先有过和山西方言大同小异的变化，其发音靠拢该方言‘壁虎’相应词，结果与此之间发生“同音冲突”了。后来为了区别两者，‘蝙蝠’前面加“夜”字，‘壁虎’前面加和“壁”同义“山墙”的“山”

(4) 如此形成“山壁虎”，后来因“壁虎”会爬山，此“山”引起让人联想到“爬山”，经过“爬山壁虎”进一步变成“爬山虎”（河北博野方言）。丢掉了“壁”字，在古清入归阴平的方言中有由于回避说与忌讳词同音的词的可能。在其他方言中大概是追求省劲的结果，因为作为常用词，四字组太长。“爬墙虎”许是从“爬山虎”造出来的。一种藤本植物又叫做“爬山虎”，又叫做“爬墙虎”，据此可推知“爬山虎”和“爬墙虎”容易混同。“壁虎”义的“爬山虎”也会同样变成“爬墙虎”。

可是如此解释尚有问题。虽然有“爬墙虎”、“爬山虎”、“爬壁虎”（云南永善方言），但未找出“爬墙壁虎”、“爬山壁虎”以及“墙壁虎”等实例。或许作为常用词极不稳定，虽曾存在过，但早已消失了。

“壁猴”的改法不是“附加说明成分”，而是“改词”。或许是由于“俗词源学”从“壁虎”变来的。这也大概同样是由于从其爬墙动作联想到爬树猴子的缘故。

安徽方言当中也曾经有过同样冲突，其解决方法是“改词”：

‘蝙蝠’ — ‘壁虎’	
安徽含山：壁虎子 pie ⁷ xu ²¹³⁻²¹ tsɿ ⁰	蝙蝠
四脚蛇 sɿ ⁵⁴ tɕyɿ ⁷ sɿ ⁴⁵	壁虎
安徽来安：鳖蝠 piə ⁷ fu ⁰	蝙蝠
四脚蛇 sɿ ⁵³ tɕiə ⁷ sɿ ³⁵	壁虎
安徽固镇：鳖虎 pie ²¹²⁻²¹ xu ⁰	蝙蝠
蝎虎子 ɕie ²¹²⁻²¹ xu ²⁴ tsɿ ⁰	壁虎
安徽阜阳：鳖 (piɛ ²¹³ (阳平)) 虎子	蝙蝠
蝎 (ɕie ²¹³ (阴平)) 虎子	壁虎
安徽太和：夜鳖虎子 (缺音标)	蝙蝠
蝎虎子 (缺音标)	壁虎 (谓其吃蝎子)

‘蝙蝠’先发生特殊音变后，由于“类音牵引”其读音靠拢‘壁虎’，引起同音词冲突。为了避免歧义，‘壁虎’改其词形，变成“四脚蛇”⁽⁵⁾、“蝎虎子”。

了。后者的“蝎”是否本字，如何形成，均未十分清楚。山东方言有“蝎壁虎”，虽然周围方言中还没发现如此形式，阜阳、太和的“蝎虎子”有经过“蝎壁虎子”变来的可能。

2. “货”（—“祸”）

2.1. “货郎”

常用词因常用之故，常常发生特殊音变。下面山西方言例子里的“货”都是原来去声由于舒声促化变成入声的：

A. 山西文水：货郎子 $xuəʔ^{312} lu^{22-11} tsəʔ^{2-35}$ 卖布匹的货郎
 (=山西大同、定襄、孟县、临县)

山西长治：忽乱子 $xuəʔ^4 luəŋ^{44} təʔ^{535}$ 货郎。“忽乱”，货郎摇的小鼓儿（小锣）发出的声音。

山西清徐：货郎儿 $xuəʔ^2 lb^{11-35} ai^{11-43}$

山西左权：小货郎 $ɕio^{53} xuəʔ^{44} lo^{53}$

山西忻州：摇货郎子的 $io^{31-42} xuəʔ^2 le^{313} tə^0 tie^0$ 货郎

山西中阳：摇货郎的 $iao^{44} xuəʔ^2 lo^{44} te^0$ 货郎儿（=山西临县）

山西和顺：货郎担 $xuəʔ^{21} lb^{22} tæ^{44}$ 货郎儿

山西山阴：货郎担儿 $xuəʔ^4 lb^{313-31} tʌr^{335}$ 货郎儿

山西长子：货郎担子 $xuəʔ^{212} laŋ^{24-212} tæ^{45} təʔ^4$

这种舒声促化一般在轻读音节出现，属于一种语流音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词组在没有舒声促化的方言里也往往发生特殊音变。下面例子大都脱落介音，并改调为阴平，呈现与A类不同另一种类型：

B. 山东平邑：货郎 $xə^{213-21} laŋ^0$ ；阴平调值：213

“货” $xuə^{312}$ （去）=“祸”；“喝貉褐鹤豁涸” $xə^{213}$ （阴平）；

“拨” $pə^{213}$ （阴平）

山东济南：货郎 $xə^{213-21} laŋ^0$ ；“拨” $pə^{213}$ （阴平）

喝楞鼓 $xə^{213-21} ləŋ^0 ku^{55}$ 拨浪鼓，一种儿童玩具

“货” $xuə^{31}$ (去) = “祸”; “喝鹤豁吓” $xə^{213}$ (阴平)

山东曲阜: 货郎鼓 $xə^{312-31}/xy^{213-13}$ $laŋ^{42-55}$ ku^{55} 货郎

“货” $xuə^{312}$ (去) = “祸”; “喝” xy^{213} (阴平); “拨” $pə^{213}$
(阴平)

山东济宁: 呵郎鼓儿 xy^{213-21} $laŋ^0$ kur^{55} 货郎 (=曲阜)

江苏徐州: 喝郎鼓子 $xə^{213}$ $laŋ^0$ ku^{35} $tsŋ^0$ 货郎鼓或小孩玩的拨浪鼓

货郎鼓子 $xə^{213-21}$ $laŋ^0$ (或 $ləŋ^0$) ku^{35} $tsŋ^0$

“货” $xuə^{42}$ (去) = “祸”; “拨” $puə^{213}$ (阴平)

货郎 $xuə^{42}$ $laŋ^{55}$ (或 $laŋ^0$)⁽⁸⁾

B'. 山东博山: 货郎 $xuə^{31-22}$ $laŋ^{55-33}$ ⁽⁹⁾; “拨” $pə^{214}$ (阴入)

“货” $xuə^{31}$ (去) = “祸”; “豁霍擻剿郝鹤” $xuə^{214}$ (阴入)

货郎鼓 $xuə^{31-21}$ $laŋ^{55-22}$ ku^{55}

cf. 山东淄川: 拨浪鼓 $pə^{214-21}$ $laŋ^{55-22}$ ku^{55}

cf. 河北大厂: 拨浪鼓儿 货郎鼓儿 (=河北乐亭、丰润、玉田、枣强等)

cf. 河北安次: 拨浪鼓子 货郎鼓儿

cf. 河北遵化: 拨棱鼓 货郎鼓儿 (=河北昌黎、滦县)

cf. 河北阳原: 八郎鼓 货郎鼓儿 (=河北龙关、永年、元氏)

cf. 河北赤城: 梆郎鼓 货郎鼓儿 (=河北龙关)

宁夏中卫: 货郎担子 $xuə^{44}$ $laŋ^0$ $tāi^{13}$ $tsŋ^0$ 手摇卜郎鼓, 沿街叫卖的小商贩
“货” $xuə^{13}$ (去) = “祸”; “豁” $xuə^{44}$ (阴平); “拨” $pə^{13}$ (去)

cf. 甘肃敦煌: 巴郎子 pa^{21} $lɔ^{24}$ $tsŋ^2$ 摇手鼓的货郎担

cf. 新疆乌鲁木齐: 巴郎鼓 pa^{21} $lɔ^{24}$ ku^{52} 持货郎鼓叫卖的小贩

为何改为阴平, 原因大概在与同义词“拨郎(鼓)”的混同。现暂把“拨郎(鼓)”看作本文所举一系列同源词最原先的形式, 其本字问题未十分清楚。下

文有所讨论。上面方言中古清入声字大都现归为阴平，“拨”字也是古清入，应该念为阴平。所据文献均只举“货郎（鼓）”，没提“拨郎（鼓）”，但看来这两个词在同一地区混杂存在，譬如河北昌黎方言中两者并存。混同会很容易发生。这种混同所引起的音变严密来说，该叫做“交感”，现把它视为同义词之间的“类音牵引”。根据如此解释，唇音声母不分开合，山东博山的例子保留介音有充分理由，可以把它同样看待。该方言的“货郎”应该采取【去声+轻：31-55+31】的变调调值，但实际音值却与【阴入+轻：214-22+33】同。“货郎鼓”的“货”也同样采取阴入调值。参看淄川的“拨郎鼓”。此例承蒙《淄川方言志》作者孟庆泰先生指教。孟先生所用淄川口头乡话与博山方言大同小异，也可以看做博山方言的一种。

徐州方言“货郎”与“货郎鼓”之间呈现分歧现象。如此分歧许是由于材料来源不同，反映所属方言层次上的差别。该方言“货郎鼓子”的“货”（亦写做“喝”）念阴平，“货郎”的“货”却念去声，而且未失去介音，与其单字音一致。如果徐州“货郎”属于新派读音，现有如下可能：一般来说，“货郎”是过去的一种行业，现已很少见。所以，日常生活中极少用到，新派读音很可能按其单字音读。另外的一种解释，即如果先在“货郎鼓”和“拨郎鼓”之间发生“类音牵引”，徐州方言或许代表“货郎”未发生类化为“喝郎”或“贺郎”的阶段。

宁夏中卫方言“货”同样单字音为去声，“货郎”里的“货”却为阴平。但与上面类例不同，“拨”字是去声。大概先有“俗词源学”所引起“拨郎鼓”改为“波浪鼓”的变化，上面敦煌，乌鲁木齐的例子也可能有过同样变化，经过如下音变过程：

po? laŋ ku → po laŋ ku → pa laŋ ku; 或

po? laŋ tsŋ → po laŋ tsŋ → pa laŋ tsŋ⁵⁵

下面是把“货郎”（=“祸郎”）改为“贺郎”，似乎发生进一步变化的例子：

C. 山东新泰：货郎 xə⁴¹（去）lā³（轻）“货”xuə⁴¹（去）=“祸”；“贺”
xə⁴¹（去）（=山东郯城、莒南）

山东掖县：货郎 $xə^{42} laŋ^0$ ；

“货” $xuə^{213}$ (阴平) = “祸”，又 $xuə^{42}$ (阳平)；“贺” $xə^{213}$ (去)

山东临清：货郎鼓儿 $xə^{31} la^{53-0} kur^{55}$ ；“货” $xuə^{31}$ (去) = “祸”；“贺”

$xə^{31}$ (去)

山东济南：货郎鼓 $xə^{31} laŋ^0 ku^{55}$ (又)；“贺” $xə^{31}$ (去)

上面例子仍然用“货”字，但与“贺”字同音。这不是偶然的事情。我们应该注意B、C之间的先后关系。上面已经谈到，这并不是唯一可能的解释。另有双方互相无关，独立变来的可能。因为一部分中古果摄牙喉音声母合口字现在不少方言中变为开口，“货”字很有可能经过如此历史音变失去合口介音。C类如不经过B的阶段的话，那么上面例子还有两种可能：一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偶然与“贺”字同音；二是由于回避与“祸”字同音，改音成立。避讳改音决不是乱改，其改法有一定的规律，即改声韵调之一部分，仍保持与原来字音之间的类音关系。不然，随便破坏音义之间的对应关联，一听新字音很难理解其原义了。从语音学的观点来看，其改法基本与语流音变一致。“货”字去掉u介音回避与“祸”字同音，也有十分可能。如此看来，我们也可以认为先有C类，B类是后来C类与“拔郎鼓”之间发生“交感”而成立的。现还不能排除如此异论，但与“拔郎鼓”之间的“交感”不必等待变成C的阶段。B类实例比C类更广泛存在，在“货”字带u介音而声调为去声的形式（即 $xuə$ (去)）仍然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这一点像是证明先有B。下面D类“货”字特殊读音不和“贺”一致。从此看来，即使忌讳词引起发生特殊音变，并不是非得改为与反义词“贺”同音。因此暂看做C类是经过B类的阶段成立的。换言之，C类是由于B类和“货郎（鼓）”（“货”字带u介音，调为去声）之间发生“交感”的结果。

下面实线以上的例子也是和B类同样与“拔郎鼓”混同而成立的。可是“拔郎鼓”的语音形式不同，因此音变结果也不同了：

D. 宁夏中宁：货郎子 $xu^{44} laŋ^0 tsɿ^0$ 旧时指挑担叫卖的小贩

“货” xuy^{13} (去) = “祸”；“乎呼孤” xu^{44} (阴平)

宁夏银川：呼郎子 $xu^{44} laŋ^0 tsɿ^0$ 货郎

陕西临潼：呼（货字转音）郎 货郎；阴平单字调值：31

青海西宁：货郎子 $xv^{44} lɿ^{24} tsɿ^0$ 货郎；阴平单字调值：44

“货” xu^{213} （去）=“祸”；“呼忽” xv^{44} （阴平）

宁夏固原：呼郎子 $xu^{24} laŋ^{24} tsɿ^0$ 货郎；阳平单字调值：24

“货” xux^{213} （去）=“祸”；“核果～胡瓢～芦乎壶狐湖” xu^{24}

（阳平）

陕西铜川：货（货音讹为 hu 上声，xǔ）郎 挑担卖京货者⁰⁰

山东菏泽：拨楞鼓子 $pu^{13-21} ləŋ^0 ku^{55} tsɿ^0$ 货郎鼓；阴平单字调值：13

河南邓州：不郎鼓儿 $pu^{44} laŋ^0 kur^{54}$ 持货郎鼓叫卖的小贩

“不” pu^{44} （阴平）（=陕西西安）

河北滦县：不郎鼓儿 货郎鼓 ← “拨郎鼓儿”（=河北迁西、南宫等）

南宫：“不” pu^{21} （去）

山东桓台：卜楞鼓子 $pu^{33} ləŋ^0 ku^{55-213} tsɿ^0$ 货郎鼓；入声单字调值：33

河北围场：不楞鼓子 货郎鼓 ← “拨郎鼓儿”（=河北滦县、元氏等）

河北乐亭：摇不楞鼓的 货郎 ← “摇拨郎鼓的”

河北晋县：摇不楞等的 货郎 ← “摇拨郎担的”

山西永济：摇布郎鼓儿的 $iau^{24} pu^{33} laŋ^0 kur^{42} ti^0$ 游商

担货郎担子的 $tæ^{21} xuo^{33} laŋ^0 tai^{33} tsɿ^0 ti^0$ （又）

山西吉县：拨郎担 $pə^{423-42} ləŋ^{13} tæ^{33}$ 摇货拨郎鼓叫卖的流动小商贩

“拨” $pə^{423}$ （阴平）

河北昌黎：拨郎鼓儿 $puo^{32} laŋ^0 (ləŋ^0) kur^{213}$ 货郎鼓儿（又）

“拨” puo^{32} （阴平）；

“不” pu^{32} （阴平）；“不～是” pu^{24} （阴去）

上面D类集中分布在西北地区，其特征是“货郎（子）”的“货”变成xu，并且其调变为阴平的占多数。如此形式也可以认为与“拨郎鼓”之间发生“类音

牵引”（严密来说是“交感”演变来的）。注意，这里的“拨郎鼓”语音形式与上面不同，是另一种类型。或许先有避讳改音，“货”（一“祸”）变成 xu（去声），此后与“拨郎鼓”发生“类音牵引”。可是未找出“货郎”的“货”念为 xu（去声）的例子。据目前材料来说，不像是经过避讳改音变来的。大概曾经有过如下变化：

puə? laŋ ku → puə laŋ ku → pu laŋ ku
（“拨郎鼓” “波浪鼓” “卜郎鼓”）

因为音近，由于“俗词源学”“拨郎”变为“波浪”，这两个音节后来一般轻读，终于 puə 变为 pu 了。第二阶段不一定需要。或许从第一阶段一下子飞跃变为第三个阶段。如果“卜郎”作为“卜者”义的词实际存在，那么后一段也算是“俗词源学”所引起的变化了。据贺巍、钱曾怡、陈淑静三位先生的论文^[8]，河北一些方言把古清入声字大都念为阴平。“不”字作为否定词极常用，容易发生特殊音变成为例外，不但其韵母不一定是 u，其调类也不一定是阴平，目前尚不能马上类推判断。可是如和其他例子一起考虑的话，其声调很可能也都是阴平。据《乐亭县志·方言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9）描写，该方言“不”字除了后面带去声的时候以外都记作阴平。如果上面其他例子里见到的“不”字与“货”字同样念为去声，这也是“类音牵引”所引起的变化了。宁夏固原方言为何把“货郎子”的“货”改为阳平，尚未找出适当的理由。24（阳平）许是214（阴平）之误。

关于“拨郎鼓”的词源，日本明治大学讲师刘光赤先生指出有根据打鼓声起名的可能，即“拨郎”是拟声词。一般来说，拟声词大都由平声拼，清声母是阴平，浊声母是阳平。那么“拨郎鼓”的头一个音节，无论用如何字来写，除了有入声的方言以外都可以认为是阴平了。根据如此看法，第一个音节反正是阴平，说起来不产生任何大矛盾。B'类中卫例子更容易理解了。但博山“货郎”第一个音节变调调值为何不和【阴平+轻】，而和【阴入+轻】一致，这一点需要说明了。现在只能说，由于避免“货”一“祸”同音而改音的结果。【去+上：31+55】（不变）和【平+轻：214-31+23】变调调值有点接近，

或许为了避免字“货”一“祸”同音，“货郎”的“货”经过与“货郎鼓”的“货”同调（即阴平）进一步变，终于采取阴人变调调值了。

如此看来，山西方言‘货郎’里‘货’的特殊音变也有由于‘类音牵引’（严密来说是‘交感’）以及‘类化’发生的可能。虽然山西方言当中还没找出适当例子，可是临接地区方言有如下例子：

河南获嘉：摇拨郎鼓的 iau³¹ peʔ³ laŋ⁰ ku⁵³ li⁰

河北邯郸县：不郎鼓儿 货郎鼓←“拨郎鼓儿”（=河北赤城）

“不” /be⁵⁴ (入)⁰³

河北沽原：不楞鼓子 货郎鼓←“拨郎鼓子”；“不” /beʔ³² /⁰³

河北万全：不楞子 货郎鼓←“拨郎鼓”；“不” /beʔ²¹ 或 bueʔ²¹ /⁰³

河北阳原：大不楞 货郎←“担拨郎”；“不” /beʔ²¹ 或 bueʔ²¹ /⁰³

具体演变过程大概如下：先“货郎鼓”和“拨郎鼓”之间发生“类音牵引”，

“货”字促化，然后由于类化“货郎”读音和“货郎鼓”的“货郎”一致。

限于目前所能看到的例子，把“货郎鼓”和“拨郎鼓”用“类音牵引”来解释，比以“货”一“祸”的“同音词冲突”更有说服力。但是还有一个未能解释的问题，即是山东、河北、河南一带既有“拨郎鼓 pu laŋ ku”，为何没有“货郎（鼓） xu laŋ (ku)”？解决这个问题要待搜集更多例子做进一步的研究。

2.2. ‘瓢虫’一‘萤火虫’

有些方言把‘瓢虫’叫做“货郎（子）”，这个词组里的“货”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先参看如下例子：

山西定襄：活口子 xuɔ² luɔ²¹⁴ tə² 瓢虫←“货郎子”

货郎子 xuɔ² luɔ²¹⁴ tə² 货郎

“货” xuɔ⁵³ (去)=“祸”

定襄方言舒声促化后，人们没意识到‘瓢虫’与‘货郎’实际上是同一个来源。拿不准本字，随便写个吉利的同音字了。下面是和定襄方言类似，此它更复杂

些的例子：

河北遵化：火梭子 $xu\gamma^{214} lə\eta^{55} tsə^0$ 瓢虫；上声调值：214=河北青龙

货郎子 $xu\gamma^{214} lə\eta^{55} tsə^0$ 持货郎鼓叫卖的小贩

河北丰润：火郎虫儿 / $hu\delta langch\acute{o}ngr/ xu\alpha^{21} la\eta^{20} ts^h u\tilde{r}^{33}$ 瓢虫

又称“火郎子” 《县志》

河北秦皇岛：火龙虫 $xuo^{214} lə\eta^0 ts^h u\eta^{35}$ 瓢虫

河北乐亭：火螂 花大姐

河北完县：虎螂儿 花大姐←“火螂儿”

河北昌黎：货郎 $xuo^{213} la\eta^0$ ；上声调值：213

“货” xuo^{55} （阴去）=“祸”

cf. 火郎虫儿 $xuo^{213} la\eta^0 ts^h u\alpha r^{13}$ 萤火虫←“火亮虫儿”

遵化方言的“货”，单字音没有记载。如不是例外字，应该念为 $xu\gamma^{55}$ 。有关变调调值如下，即【上声+轻：214+0】（不变）；【去声+轻：51+0】（不变）。所据文献没有说明三音节的变调情况。从此推想，“货郎子”里的“货”应该是51调，但实际调值却与【上+轻】同。昌黎方言“货郎”的“货”字也与此相同。单字调阴去，该采取【阴去+轻：55+0】（不变。少数为55-24+0）的变调调值，但实际调值却与【上+轻】同。就是说，上面河北遵化、丰润、秦皇岛、昌黎、乐亭以及完县的‘瓢虫’、‘货郎’相应词头一个音节都读为上声。其理由该归于‘瓢虫’和‘萤火虫’两个词之间发生的“类音牵引”。先参看下面例子：

‘瓢虫’

山东青岛：货郎鼓儿 $xu\alpha^{42-55} la\eta^0 kur^{55}$ 七星瓢虫，主要捕食蚜虫

小货郎儿（又）

山东平度：货郎鼓儿 $xu\alpha^{53} la\eta^0 kur^{55}$ 瓢虫的统称（=掖县）

河北丰润：货郎虫 花大姐

货郎子 花大姐

山东胶州：货郎 /huòláng/ xuə⁵³ laŋ⁰ 花大姐
山东即墨：货螂 xuə⁴² laŋ⁰ 花大姐（七星瓢虫）

‘货郎’

河北吴桥：货楞 货郎（=河北三河）
河北迁西：货楞子 货郎（=河北遵化、蓟县、宝坻、玉田、青龙）
山东即墨：货冷 货郎，农村行商者亦专指卖布绒线者而言

‘货郎鼓’

河北黄骅：货冷鼓 货郎鼓
 货楞鼓儿 货郎鼓（=河北吴桥）

‘萤火虫’

河北昌黎：火郎虫儿 xuə²¹³ laŋ⁰ ts^huor¹³ 萤火虫
河北抚宁：火/lēng/虫儿 萤火虫
山东平邑：火连虫 xuə³⁴ lian⁵³ p^həŋ⁵³ 萤火虫
云南维西：火亮虫 xo⁵³ liǎŋ²¹³ ts^hoŋ³¹ 萤火虫
安徽霍山：火亮虫子 xo²⁴ lian⁵³ ts^həuŋ²¹⁴ tsŋ⁰ 萤火虫
安徽安庆：火亮虫儿 xo（上）lian（去）ts^hoŋ（阳平）or（轻）萤火虫
可能‘萤火虫’先有过如下音变：

“火亮虫” xuə lian ts^huŋ → xuə laŋ ts^huŋ → xuə ləŋ ts^huŋ

其语音形式靠拢‘瓢虫’该方言相应词“货郎虫”，与此容易混同了。如果“货郎虫”第二个音节的主要元音弱化发生 xuə laŋ ts^huŋ → xuə ləŋ ts^huŋ 的变化，那么除了声调以外没有任何区别，尤其容易混同。说起“货郎虫”，很容易联想到“火亮虫”。“货”字改为“火”字是并不难理解的。如此音变或许背后有避讳改音的意图，但不必提到它。可以认为是完全由于“类音牵引”把“货郎虫”的“货”解为“火”的结果。参考文献所举遵化“萤火虫”相应词为“棉花虫 mien²² xuə⁰ ts^huŋ⁰”。看来没有呈现与‘瓢虫’之间类音关系，按

李行健先生《河北方言词汇编》(商务印书馆 1995.10)的分区,上面河北抚宁方言和遵化方言同属于唐山地区次方言。这两个方言性质大概比较接近,遵化方言也会另有与此同源的‘萤火虫’相应词。如此内部差异是并不罕见,不难设想的。关于‘瓢虫’,此外还有因其颜色用“火”字的可能,但‘瓢虫’的颜色不一定是红。即使红色瓢虫会有代表性,这个解释没有前者说服力强。完县“虎螂儿”的形成过程大概如下:“货郎(虫)”与“火亮虫”发生“类音牵引”变成“火郎”(亦可写作“火螂”),带儿化后与“虎狼”发生“类音牵引”或者第一个音节韵母弱化,终于变成“虎螂儿”。无论如何,此形式显然是经过“火螂儿”变来的,与上面2.1中所介绍的D类不同。

上面2.1至2.2中列举的例子大体上都可看做“货郎鼓”和“拨郎鼓”的混同所引起的特殊音变,解释不必提到避讳改音。可是忌讳词的存在促进同音词的特殊音变也是在现代方言中普遍看到的倾向。上面例子背后到底有无“祸”字,如果有,“祸”字所引起避讳改音与“类音牵引”有什么关联,这两种特殊音变发生的程序如何,这些问题均还待详细研究。

3. “货”—“祸”余论

很多方言忌说“棺材”,单说“木(头)”、“器”、“材”、“货”等等,或者前面加“寿”、“喜”字,如“寿木”、“寿器”、“寿材”、“寿货”;“喜木”、“喜材”、“喜货”等等。下面例子看来像是“货”字因与“祸”同音,发生避讳改音的结果:

山东郯城: 脍	xə ⁵⁵	棺材; = “活”	xə ⁵⁵ (阳平)
	“货” xuə ⁴¹ (去)	= “祸”	
江苏徐州: 脍	xuə ⁵⁵	棺材; = “活”	xuə ⁵⁵ (阳平)
	“货” xuə ⁴² (去)	= “祸”	
河南开封: 喜	口	寿材; 阳平调值	41
	货郎担儿	货郎	
山东博山: 寿活路	səu ³¹⁻⁵⁵ xuə ⁰ lu ⁰	棺材	

山东淄博：活路 xuə⁵⁵⁻²⁴ lu⁰ 棺材=山东邹平
 山东日照：生活 səŋ²¹³ xuə⁰ 棺材

河北赤城：卖生活的 货郎←“卖活的”←“卖货的”
 河北龙关：卖货的 货郎

山东平邑：牀 xə⁵³ 棺材；≠“货” xuə³¹²（去）=“祸”；
 ≠“活” xuə⁵³（阳平）

河南郑州：牀 xuə³¹² 棺材；=“货” xuə³¹²（去）=“祸”；
 ≠“活” xuə⁴²（阳平）
 （=河南获嘉，开封³⁰，濮阳，沁阳，林县）

河南卫辉：喜牀 寿木，寿材

河南商水：喜货/xi⁵⁵ huə³¹/ 为活着的老人准备的棺材

河南太康：喜活/xi⁵⁵ huə⁵³/ 给老人生前预制的棺材

河北巨鹿：土货 t^hu⁵⁵ xuə¹¹ 棺材的婉辞

河南上蔡：土活/tu⁵⁵ huə⁵³/ 棺材

和本文上面提出其他例子一起考虑，也有本字为“货”的余地。如果是这样，这些例子都把“祸”改为“活”，意指‘死’转为‘活’。譬如山东博山例子把“寿货”改为“寿活”，再加上“路”字来找出活路，较为明显看出此意图。山东淄博、日照、河南太康、上蔡的形式中也可看出同样意图。那么，“牀”许是“货”字产生了“棺材”义以后，为了区别于普通词义的“货”，破读为阳平，随之打上的白字了。但我们应该注意，中古以前“货”、“活”两字区别不只在声调，声母、韵母都不同，不能说有类音关系。如果早期发生如此避讳改音，很难设想改为与“活”同音。

“牀”字早已在《广韵》，《集韵》中都有记载，如：

《广韵》：户戈切（果合一平戈匣）“棺头”

《集韵》：胡戈切（果合一平戈匣）“𦵑，博雅，棺当谓之𦵑，或从木，通作和”

cf. “货” 《广韵》：呼卧切（果合一去过晓）

cf. “活” 《广韵》：户括切（山合一入末匣）

“𦵑”字很可能从古老时代起一贯存在。虽然上面例子含有还要进一步检讨本字的，现认为“棺材”义词的“𦵑，口”（阳平）和“货”（去声），来源不同。河南郑州等方言中把“𦵑”读为去声，可能是“交感”的结果。就是说，如上“棺材”义词里看到的“货”字音的分歧果然与3章里介绍的特殊音变似是而非的现象。⁹⁹

在讨论会报告之后，承蒙岩田礼先生指教。另外有机会在汉语史研究会（于日本青山学院大学 1997. 11. 2）介绍本文内容。此时刘光赤女士以外，钱曾怡、平山久雄、远藤光晓等先生以及其他参会的人也给我提供宝贵意见，谨此鸣谢。

注：

- (1) 贺登崧 (W. A. Grootaers) *La géographie linguistique en Chine*, *Monumenta Serica* X, pp. 389-426 1945; 现用日译本：岩田礼·桥爪正子《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好文出版 1994. 9)。岩田先生曾在《汉语方言史の不連続性—中国语言地理学序说—》(静岡大学人文学部人文论集 45-2 1995. 1 第43-77页)举河北、山西方言的例子讨论过这个问题。
- (2) 参看，岩田礼《读〈山东方言志丛书〉六种》，《中国语文》1996年第3期 第236-240页。该文举了一些山东方言的例子介绍“同音牵引”（即“类音牵引”）和“同音冲突”。
- (3) 两项词例出处不同，记音法不一致。
- (4) “山”有“山墙”的意思，这一点承蒙中国语言文化大学研究生张世方指教。
- (5) 不少方言里“壁虎”和“蜥蜴”区别并不明确。看方言，同一词形又指“壁虎”，又指“蜥蜴”，如：“四脚蛇”：云南永善方言指“蜥蜴”。
- (6) 【阴平+轻声】变为213-21+0；【去声+轻声】变为312-32+0。（第15页）
- (7) 据同一文献，变调调值如下：【阴平+轻声】变为213-21+0或213-22+0。后者阴平多为中古清入声字；【去声+轻声】变为31-42+0。（第11页）
- (8) “货郎”读音承蒙徐州师范大学吴继光先生指教。
- (9) 博山方言阴入单字调与阴平同，因此所据文献不分两者，把它归于一个平声。可是变调调值不尽相同。如：【阴平+轻】213-31+23；【阴入+轻】213-22+33。同样，阳平（古浊平）和上声（古清上与次浊上）也在单字音系中合并。在一些条件下变调调值不同。参看钱曾怡《博山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6 第25-31页。
- (10) 乌鲁木齐方言的例子出自刘俐李《回民乌鲁木齐语言志》(新疆大学出版社 1989. 8 第109页)。周磊《乌鲁木齐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 12)有：

巴郎鼓 pa⁴⁴ laŋ⁴⁴ ku⁵¹ 玩具，带把儿的小鼓，来回转动时，两旁系在短绳上的鼓槌击鼓作声

巴郎子 pa⁴⁴ laŋ⁵⁵⁻⁴⁴ tsɿ⁰ 孩子，儿童 || 借自维吾尔语 [bala ŋiz] (孩子+第二人称) (第72页) 不知西北地区维吾尔语对汉语方言有多大影响。如果先有这个‘巴郎子’，且该词作为常用词相当普遍存在，那么‘拨郎鼓’头一个音节变为 pa 或许也是联想到类音词‘巴郎子’的结果，这就是‘俗词源学’所引起的变化了。

- (1) 原文 hu 用注音字母拼写，现改为汉语拼音。xǔ 如原文，是拉丁字母。此项所上说上声到底是当地上声，还是普通话上声，含意未详。
- (2) 《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方言的分区 (稿)》，《方言》1986-4 第241-252页
- (3) ‘不’字音现据《河北方言概况》(河北人民出版社 1961. 10) 推测。
- (4) 上面开封方言的例子据《开封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7 第529-552页)。这里的例子据《河南省志·方言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11)。
- (5) 笔者在前文《北方方言怪音例集 (2)》(《神户外大论丛》46-2 1995. 2) 里把与 3 的例子同样看做避讳改音，改词。此处为修改后的意见。

※本文原题为《‘同音词冲突’和‘类音牵引’》，在首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1997. 7. 22-24 青岛)上宣读，拟载于《首届官话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但远超过篇幅限制，《文集》只收了第一章。编辑部允许全文另外发表。这次发表，如上改题，增加了若干例子，修改了一些文句。